

读史阅世

陈寿璠及其子诗集中的人生档案

□本报记者 谢海潮

1947年,福州人陈策骐(字逸韩)五十眉寿征诗,堂兄陈声聪赠:“与君数雁序,少于我一岁。少小随官宦,满口粤语利。门前逐儿嬉,绝不受誉。论辩高抗人,我弱辄先避。”笔调轻快,而历史却显示其吊诡的另一面:辛亥年(1911年)陈策骐14岁,其父陈寿璠(1873年—1945年1月4日)成了清代嘉应州(今广东梅州)末任知州,在“杀降”事件中备受煎熬,凄然返乡。

“杀降”与“清算”

梅州光复以“兵不血刃”开局,继而游击白如镜以“兵变不屈死”载入《辛亥殉难记》(清遗编撰),不久便是“五虎(甫)闹梅州”,风云突变,得失均在于当地革命党人派系众多的事实。李汉为当过调解人,计其《梅州光复片断》所列武装力量,有“冷圃”主导、学生军、松军等6支义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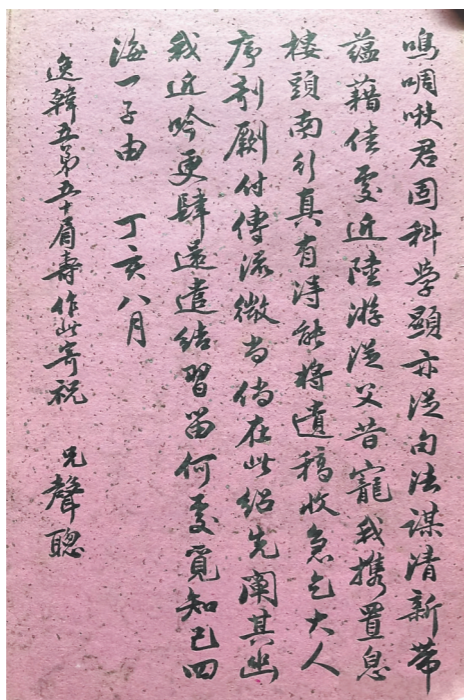
叙事人立场不一,引发“罗生门”式的观感。参与策反游说的黄干甫记述,“知州陈寿璠、游击白如镜各自向梅军司令部投降,交出所有公款及旧式枪械”,“命令他们暂时回原衙署居住,俟水路通时,准予安全离梅”。但陈寿璠心存恐惧,“在衙住了数天,便随同县人陈春舫(教育会)到南口圩陈姓家中暂避,以求安全。而游击白如镜系满洲人,无处可投,仍在原衙居住”。叶菊生是《讨清檄文》起草人,则言“知州陈寿璠弃职逃跑,游击白如镜无抵抗”,未几“熊越山(同盟会员)亦至……将白牵出大堂枪毙,至引起内部发生裂痕”。

混乱的场景叙述带出问题:是“弃职逃跑”,还是“在衙住了数天”“暂避”与“杀降”孰先孰后?

温静远与“杀降”事件关系较为直接,据其回忆:1911年11月11日当晚,“冷圃”派已说服巡防营放弃抵抗,梅州和平光复。11月14日,熊越山率其旧部在汕头联络的志士20余人返抵州城,发现光复后的梅州毫无革命气象,“即向松军(由温静远带队)取去手枪五支,率其同来志士直趋旧游击衙门,把压迫人民多年的游击白如镜枪决了”,接着就“清算知州陈寿璠所掌管之库存”,查出白银五万余两。

陈策骐《先君行述》提供另一视角:旋革命军起,四方响应。八月(应为农历九月下旬),暴徒诡称革命军侵入州城,武官殉难,转毁州署,先君暂引避。暴徒既肆搜索,翻账目,坚请先君出见,逼清算账目。先君不动声色,将履任后收支详数一一清点,余款与暴徒所搜索者适相符。暴徒始服服乞留,先君力却之,乃赠资斧九百元,沿途酒肉相款护送出境。

其文字固然有“为亲者讳”“美化歪曲”之嫌,也和其他叙事一样“许多情况和人名不易记忆清楚”,却可为“温静远版”理清眉目,明



1947年,陈策骐五十眉寿征诗,陈声聪寄诗三首,《兼于闻诗话全编》未录,见于听诗斋2024年4月6日微拍“清代民国文人手迹专场”。

确了“杀降”“清算”时,陈寿璠尚在州城。

“七绝”与“楹联”

晚清梅州贡生王漱薇《海联最话》收录陈寿璠两联,并云:陈牧置任,方及一年,适遇辛亥沧桑,为革命激烈分子窘,所有行李衣服,概被抬出大堂焚燬。是时值白游击被裁,民情震骇,而革命中和平分子制止弗听,几乎闯城。幸有人调停,陈牧始免于难,后逃出南口族人。事定后,由族人捐资协助回籍。

《海联最话》修正和完善了陈策骐的叙事,“南口族人”的集体记忆也有所印证。南口圩在梅州西14公里,《舜裔源流世系暨先贤事迹》(1977年台北初版)由南口陈直夫编纂,这部族谱写道:那时武昌革命成功,梅县亦准备起义,先父(陈亮筠)与族叔春舫参与其事,为避免伤亡,乃先祖父(陈国梁)与州官陈寿璠私交甚好,乃嘱先父秘密向州官说降,请其下令不抵抗,本族保其家人安全。陈州官目睹国家大势,不得不服,乃表同意,先祖父遂接其全家到来南口住于嘉莲书屋。

这些说法可与“官绅密谋独立”(李汉为说),对革命组织活动“从来不加过问”等史料交叉互证。光复前夕,有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满清,光复中华”等口号,并未引起任何冲突;光复之日,“均剪去发辫向梅军司令部投降”。陈寿璠当年不到四十,岂能以“老朽

无知”草率形容。王漱薇说陈寿璠“当时有感怀七绝十余首,州人多抄闻之”。资料也称“州牧陈寿璠闻风惊逸,留诗‘适声’,嗟叹而去”,“适声”或指梅州绅士黄玉屏(参与官绅密谋)的寓所。陈寿璠《息楼诗集》只字未录,但李汉为摘抄四首,其二云:“义旗所举扶黄,人已归降杀不祥。况乃无厌将及我,同胞二字太荒唐。”

其四为接“乱世家书”感怀:“先声报道成灰土,搔首苍天泪满襟。”1917年,林纾与陈寿璠书:“回念保福山(今福州八中一带)故宅,弟曾经过,闻群从书声,辄太息尊人之有福。”是否指此?王铁藩说陈寿璠“居化民营通天境巷”,即陈声聪所谓“左首仍存庆城寺,西街无改并楼门”,可见陈家前后均维系同堂而居。

至于他的官癖题联,署大堂云:“要怎样清慎勤,惟见得天难欺、民难欺、长官难欺,求无过不求有功,毁誉何妨听舆论;说甚么才学识,但视夫情所在、理所在、国法所在,弗受德亦弗任怨,鉴衡且自慎冰心。”花厅云:“事本至公,何妨入室;吏原非俗,再求读书。”文字可通神,当地文史学者有感而发:视其楹联志趣,也是一位想在任上有所作为的官员。无奈满清政治腐败,大厦将倾,陈亦无所作为。

涉及梅州,《息楼诗集》只提一件往事:“魏君润民,五华(嘉应州属长乐县,鼎新后改名今)人也,来闽为推官,谓于梅州任内平魏、李斗案,至今犹有称颂者。书此志愧。”指的是“两姓争山酿斗,互相掬杀百余人”,陈寿璠带兵弹压、划界勒碑,妥善处理了这起恶性事件。

陈寿璠携家眷(育有一男两女)避难南口,陈直夫时年4岁,但坚称自己尚能记忆:“她们多系小脚(缠足),她们给我见面礼是银圆也。梅县事平之后,便护送他们到汕头乘轮船回去福州。”

“祸福”与“毁誉”

陈策骐著有《倚寒楼诗》,编选其1919年至1962年的诗作,开篇题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参与北京学生示威游行感赋”,首联是“忧国书生策杖陈,拼将热血洒风尘”。陈寿璠《韩归儿归,用放翁遣舟迎子通均》诗中自注:“京师学生以争青岛事全体被逮,儿亦与焉。”勉勵其子:“祸福勿避趋,言之必可行。”

李汉之所以抄录四首诗,是要“充分暴露了他对革命的不满”“让后人看看当时清廷官吏的心态”。实际上,陈寿璠并非一个介风不俗吏,也不像沈瑜庆这般老抱缺守残。入民国后,他供职于福建财政厅,其作为今人多有提及。而从1934年的司法行政部训令,可知其亲家、时任江西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的林炳勤还努力为他谋求该院检察处“主任书记官”一职,这一职务并非临时性,因为迟至1944年6月17日,尚有“调任陈寿璠试署福建闽侯地

方法院检察处书记官”的部令。事实远非《先君行述》“癸酉(1933年)春,先外舅林仲立公箠箠法院,约往游居三年”那般轻描淡写。尽管工作时时断续,去世前数月,陈寿璠还在为“衣食谋”奔波。

陈寿璠晚景不佳,而陈策骐履历颇丰,堪称民国“理工男”的标配,从《中国工程人名录》(1941年版)可一窥大概:1897(《林则徐世系录》载其生于1898年),福建闽侯;北京工业大学电机,1922(毕业);美Harvard U(哈佛)电机硕士,1928(毕业);福州无线电报局工程师;海军总司令部技正,电信科长,海军部科员;劳动大学电机系教授兼主任;江南造船所电机工程师;汉口无线电总台管理工程师,1934;交通部湖北电政管理局总工程师,1937。

1926年6月,《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刊发“陈策骐君将赴美深研电机工程”的游学新闻,补充了他早年“福建省立第□中学数理教员”等从业信息。原计划是去“美国纽约省(州)之康乃尔(奈)尔大学”,定于“八月二十二日与清华团乘麦金兰(莱)总统号同舟放洋”;《倚寒楼诗》也透露不少个人行踪,如《汉口闻警》(1938年)自注:“时负有留守任务,避居法租界,冒死设台与后方联系,处理善后工作。”

1946年已见陈策骐任“重庆电信局副局长”的报载。1949年底解放大西南期间,在“十六条杀令”恐吓下,陈策骐仍积极参加“护局”活动。1950年留任,后又见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教授”名录。1955年7月20日,北京邮电学院成立,重庆大学相关师资是其一大班底。陈策骐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第三届委员,社史资料《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显示他1955年8月27日“自重庆分社转来”,任“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主任”。

之后如陈声聪所言,“嗣调河南确山,复回川”“癸丑(1973年)退休”“乞居成都”“近哀其新旧作若干首曰《晴川集》”(《逸韩五弟八十赠诗》一九七七年丁巳)。所指应与“北邮”于1969年起迁至确山筹建干校、更名诸事有关。

校史档案显示,陈策骐是1961年度“北京市先进生产者”。值得玩味的是,现今“孔网”贴出一册《倚寒楼诗》(约1962年版)书影,内页原持有者加注不少眉批,那首“五四感赋”被批为“美化自己”;《与一隅晚步》“琴声灯影来歌馆,花气鱼腥过酒家”招致恶评:“回忆解放前花天酒地旧官吏生活,糜烂生活,黄色。”陈策骐于1978年去世,其人生正应了“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的古训。

作为上海诗坛一代盟主,陈声聪评点五叔父陈寿璠诗“近随园、瓠北一路,入社(说诗社)后力求深质,而终以本来面目为佳”,逸韩五弟“清新带蕴藉,佳处近陆游”,而从“诗史”的角度来看,父子两诗集恰是其人生档案的黏贴脚注。

史海钩沉



鹰厦铁路修建中的青春之歌

□丘新洋 严世恩

1955年2月11日,作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项目的鹰厦铁路正式动工上马。1956年12月,连接江西鹰潭与福建厦门的鹰厦铁路全线通车。

从动工到通车,仅22个月便实现全线铺就的成绩,鹰厦铁路的顺利通车和提前完成,离不开王震将军率领的13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干部和战士的艰辛付出,也与闽、赣两省11万支前民工们的积极奉献息息相关。此外,鹰厦铁路青年志愿筑路队的付出与奉献亦受到关注和铭记,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奉献祖国、奉献人民”的精神仍值得当代中国青年学习。

1955年9月、10月间,铁道部作出鹰厦铁路提前一年完工的决定。工期的缩短,任务的紧迫,使支前民工中技术人员紧缺的问题逐渐显现,“交代任务不清楚”“任务计算不准确”“技术指导不经常”等状况层出不穷。换言之,“鹰厦铁路开工建设不久,就出现了管理建设人员严重不足的现象”。为解决技术人才紧缺的问题,1955年年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新青团”)福建省委先后发布《关于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鹰厦铁路青年志愿筑路队需要了解情况的通知》《关于动员知识青年组成“鹰厦铁路青年志愿筑路队”的工作方案》文件,着手筹建由青年学生组成的“青年志愿筑路队”,并积极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加入鹰厦铁路修建的队伍中来,发挥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与普通支前民工相比,青年志愿筑路队队员的招募条件除要求政治清白、身体健康外,对学历亦有一定的要求,主要从初中、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以至于一度被铁道兵戏称为“四多兵”,即“带党团证的多,带钢笔的多,戴眼镜的多,小白脸的多”。在各方协同推动下,青年志愿筑路队组建的工作稳步推进,招收工作取得巨大成绩,青年学生间涌现出积极报名的热潮。资料显示,福州市仓山区报名参加筑路队的青年学生数是分配任务的20倍;惠安县召开的有80人参加的座谈会上竟有77名申请报名;仙游县城关镇90%的青年学生写了志愿书或申请书;闽清县坂东区招收20名却有100余人报名。

一些青年华侨学生也踊跃报名,他们在申请书中写道,“我要把青春毫不吝惜地献给祖国,来报答祖国对我的培养”。当然,也有部分青年学生报名参加是希望将来可以从事相关行业,如一位青年学生所言,“等铁路修好通车以后,能在火车上卖票”。当时出台的相关政策表示,鹰厦铁路通车后,青年志愿筑路队队员可以成为铁道兵。

从1955年12月5日首批青年志愿筑路队抵达南平铁道兵领导机关所在地报到至1956年5月间,福建省共组建3批、人数达2167名的青年志愿筑路队,呈现出共青团员占比较高、初中学历多于高中学历、多数学生来自沿海学校的规律。以首批878名青年志愿筑路队成员为例,他们当中有41.1%的队员属于共青团员,68.3%是初中生,97.7%来自沿海城镇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人身安全、劳动强度等因素考虑,1955年10月新青团福建省委曾下达通知,明确规定青年志愿筑路队暂不招收女性青年学生,但不久此规定便出现松动,开始招收符合条件的少数女性青年学生。除与新中国成立后女性身份和地位得到较大提升有关外,或许也与福建女性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加筑路队有关。因此,第二批招收的880名青年志愿筑路队队员中便出现了162名女性青年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因为表现优异担任了筑路队的小队长。

初时,青年志愿筑路队与支前民工一道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个青年志愿筑路队成员回忆说,他们“利用洋镐、洋锹、锄头、土箕等简陋工具,在荒郊野外安营扎寨,移山劈石”。但由于体力和年龄的差距,青年学生的劳动效率远低于支前民工,如普通支前民工的工效每人每天可完成3至4方土,而青年学生仅能完成1方多。

为扭转此种不利局面,青年志愿筑路队成员虚心向铁道兵和支前民工学习,高扬艰苦奋斗精神,努力提高劳动工效,发挥他们学识上的优势,改进和推广了“土耙犁”“土滑梯”“小推车”“滑钩挑土”等劳动工具,提高了铁路修建的工作效率。经过一段时间的工地生活和劳动的适应,青年志愿筑路队成员逐渐成为鹰厦铁路修建的一股新生力量,有的青年学生经过考核后甚至走上半脱产性质的技术管理岗位。

青年志愿筑路队为鹰厦铁路的提前完成作出巨大贡献,为此新青团福建省委针对部分青年学生的表现给予工作安排。正如一份文件显示,“至1956年4月30日止,青年志愿筑路队所担负的工程任务已大多完成,其中有1737人自愿参加铁道兵随军工作,留在南平西芹附近继续筑路的现职413人,铁道兵要求他们最迟于5月底就要完成这段工程,工程结束后,这些筑路队员绝大部分将由铁道兵给予分配工作”。有的善于演奏乐器,被调入铁道兵文艺团从事文艺演出工作;有的成绩优异,被选送到铁路专业学校继续深造,为新中国铁道事业储备人才。

福建青年志愿筑路队虽然仅是鹰厦铁路修建队伍中人数甚少的组成部分,但因为他们学识较高,充满着爱国热情和青春朝气,为福建铁路建设注入一股新兴力量,也为将来中国的铁路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乡土琐记

平生未曾到访,谢安何以成为闽南王公?

□林娟芳 文/图

龙海颜厝镇位于漳州九龙江西溪南岸,其古县社中部巧山村有座古县大庙,也称为“谢太傅庙”或“积善庙”,主祀晋代太傅谢安(320—385年,字安石)。

积善庙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仅知宋元年间修庙,又在清雍正、嘉庆、道光、咸丰、宣统和民国时期经历了数次重要的修缮和维护。现存积善庙坐西向东,宽17.5米,深29.6米,占地面积780平方米,建筑面积518平方米,官衙府第建筑风格。

建筑整体坐落在七级台阶之上,彰显出尊贵地位。其主大门两侧各设有一个边门,共同构成一个凹字形的布局,显得庄严而古朴。大门上悬挂一匾额“鄱山福地”,边门四方柱古门联曰:“肥水建功勋,咸钦圣德;鄱山崇享嗣,共答神庥。”门前摆放着一对造型简约的立方体石鼓,其上雕刻着精美的麒麟图案。

进入府内,前殿正上方悬有一面大匾写着“神威万世”,两侧立着玉石雕成的凤柱。柱联为“优游却壮骑三千,一局棋中早已运筹决胜;精锐破雄兵百万,八公山上谁不服教畏威”,落款为“乡进士揀选知县郑锡周敬撰”。

后殿则以两根雕刻着龙图腾的柱子为特色,梁上悬挂着“东山辅晋”“苍生雨霖”两面横匾,两侧有两对浮雕龙柱,分别刻着“新亭一语振权奸,扶危定倾克复晋祚;北府三军多义勇,披坚执锐扫秦氛”和“东山扶晋祚,济世匡时,允矣金陵顿辘;肥水扫秦氛,运筹决胜,卓哉江表伟人”。

根据“古县大庙诸神简介”,积善庙主祀王公谢安,配祀二王谢石、元帥爷谢玄、妈仔谢道蕴、大媽二媽。据庙祝介绍,积善庙把每年农历十一月廿六日为谢安诞辰日,正月初四至初七是谢安王公出巡社境之日,其时热闹非凡,香火远播海内外,每年都有信众前来进香朝拜。

谢安死后被民间尊奉为神灵,主要源于其杰出的政治成就、高洁的品性和深厚的文



化素养,而在淝水之战中的辉煌战绩,更被视为是智慧和勇气的象征,被赋予了神话色彩。谢安忠诚、智慧和勇敢的形象在民间传说中被广泛传颂,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实际上,谢安一生未曾到访闽南地区,但在闽南地区,谢安被尊为“广惠圣王”“显济灵王”“广惠王”等,是当地民间信仰中重要的神祇。当地人通过建立庙宇、举行祭祀活动来纪念他,祈求平安和吉祥。其庙宇遍布漳州市城、龙文区、龙海区及漳浦、南靖、平和、诏安、长泰等。

关于闽南地区为什么会奉祀谢安,一直难以有准确考证。其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说法是陈元光入闽时所奉。清代林登虎、陈汝成在《漳浦县志卷之一·方域志上·沿革》中写道:

“谢东山庙,浦乡里到处皆有之。相传陈将军自光州携香火来浦,五十八姓同崇奉焉,故今祀于民间。”《海澄县志卷之十九·方外志·庵》明确指出:“谢广惠王即晋谢安石也,陈将军元光奉其香火入闽启漳,漳人因而祀之。”《平和县志》中亦有类似说法。因此,学术界往往引用闽南地区相关县志的记载,认为谢安香火是由陈元光从北方传入的。

唐代陈元光父子及其部下的入闽定居情况,主要通过地方志、族谱以及民间传说等方式流传下来。由于当时的历史记载手段有限,加上战乱和时间的侵蚀,许多原始资料已经散失,因此谢安信仰由陈元光传播入闽的说法很难确切考证。但陈元光父子入闽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谢安信仰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应与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和文化



交流有着密切关系。还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说法指出,谢安的后代在迁徙至福建时,携带了与谢安相关的香火。龙岩市的谢氏家族便是其中一例,他们自称是谢安的后代,并将“圣王公”作为家族的守护神进行供奉。

但这一说法主要基于家族传统、口头传说或地方志的记载,缺乏翔实的历史文献和确凿的证据,往往难以得到学术上的验证。家族溯源和祖先身份的认定,通常需要经过严谨的历史研究和族谱比对来进行,在没有翔实确凿的历史文献支持下,这类说法更多地体现了民间对历史人物的尊崇和对家族渊源的自豪感。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海峡文化研究中心)